

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围棋文化论

◎ 梅铮铮

【摘要】 围棋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流行，具有激发人们谋略、计算等益智的功能。同时，时代背景对其影响甚大，在两汉三国时期，偏重于兵法运用、谋略的运筹。两晋南北朝时期，则多成为展现名士矫情镇物的工具。围棋作为体育项目之一活跃至今，与自身蕴含的文化内涵密不可分。虽然中国古代尚未有西方近代体育这个观念，但它的娱乐、休闲、锻炼人的意志、公平竞争的特性，是与体育功能相通的。

【关键词】 围棋；娱乐文化；时代背景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7)09-0023-8

围棋大概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体育文化贡献最伟大的益智类运动之一，其起源殆不可考。从文献记载来看，明人方以智《通雅》引先秦典籍《世本》载：“尧造围棋”说流传最早，影响最大。晋人张华肯定此说，并在《博物志》中将其发展成“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按，《世本》今人稀见，张华者晋武帝时拜中书令，官至司空。时人说他“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瞻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1〕}应该指出的是《博物志》一书流传过程中经多人改动，今本《博物志》并无关于尧、舜造围棋等语，所载之事须慎加考求，但这并不影响该书对后世的影响，故“尧造围棋”之说，被后代多为引用。正因其围棋源起何时一直以来扑朔迷离，唐人皮日休在其所作《原弈》中认为：“弈之

始作，必起自战国”。另外还有“乌曹造围棋”“容成造围棋”之类说法。上述诸说，多为传奇异闻，这在可信度上大打折扣。然而不争的事实是，至少春秋时一定有围棋活动，只不过时人称为“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鲁襄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47年。该文讲述太叔文子批评宁喜政治上不成熟，说他对待国君还不如下棋，后果是祸事将难免了。下棋者“举棋不定”，优柔寡断是不能取胜的。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春秋时期，太叔文子将国家大事都用弈棋作为比喻，一是说果断决策是争胜负的必要条件，若举棋不定往往陷入困境；二是通俗易懂，众人都能理解接受。今引用这条文献，不过是想充分证明围棋活动在当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国古代体育文物调查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5ZDB145）成果。

〔作者简介〕 梅铮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馆员，四川 成都 610000。

时已经相当普及。

本文无意于探讨围棋起源、对弈规则等细节，而是着眼于在魏晋时期，尤其是三国时期围棋文化的发展及时代特点。因为围棋在不同时代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娱乐文化内容，也会因特殊社会背景影响下，成为人们掩饰内心真实达到某种目的所常借用的道具。以下逐一论述之。

一、两汉时期围棋

前引文献已证围棋于春秋时期已普及，虽然如此，但围棋活动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不高的，孔子就认为“博弈”算不上高尚之事，仅仅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2]好一点。孟子更指斥其为五不孝之一，说：“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3]可见围棋仅仅属于人们娱乐活动的范畴，对于它所带来的精神享受和文化价值未能被充分认识。

迨至两汉，有材料表明围棋活动十分流行，下棋者身份也不论贵贱。2000年8月7日《光明日报》载：陕西汉阳陵先后发掘出土六件陶质棋盘，包括两件围棋盘和四件“六博”棋盘。两件发现于陵园南阙门遗址围棋盘比1954年河北望都县东汉一号墓中发现的石质棋盘要早近百年。而且棋盘是利用铺地方砖刻制，做工粗糙且出土于南阙门遗址，推断出不是皇家之物，应为守陵者信手而为，以供闲暇娱乐。棋盘虽能随意为之，但棋子分两色，多为石质或矿物材料磨制而成，这就有一定要求了，所以两汉上层的围棋活动更多些。《汉书·广川惠王刘越传》记载：广川惠王刘越之孙刘去，承继广川王之爵位，此人一方面接受严格的正统教育，一方面又爱好广泛，“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另外，淮南王刘安亦为深解围棋之道者，其著作《淮南子·说林训》中提到“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视围棋为具有一定哲理的活动。2015年的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围棋盘，2016年该墓主被确认为汉废帝刘贺，证明围棋在西汉时期，已成为王侯贵族的十分喜爱的娱乐方式之一。

不少帝王也都是围棋活动的爱好者和推动

者。《西京杂记》卷三中通过记录戚夫人侍儿名叫贾佩兰言宫中诸多快乐之事，其中特别说道：

“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在当时，男人下围棋是正道，女人参与就会灾异发生，好比“水以东流为顺走，而西行，反类逆上……西王母，妇人之称。博弈，男子之事。”^[4]但《西京杂记》所记，似乎打破原来的禁忌，透露出汉高祖刘邦本人不仅十分喜欢下围棋，甚至戚夫人也参与其中，并进而推广出围棋的胜负竟然关乎人生健康幸福。“胜者终年有福，”负者还需“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这种说法不应该看作为戏言，因为作者是很慎重的将其记载于与戚夫人有关的杂记中，这样一来使得围棋文化中娱乐成分之外带上了诡异的神秘色彩，至少汉高祖和戚夫人下围棋有这种说法。

喜爱围棋的皇帝不止汉高祖，汉宣帝也是围棋爱好者，还是棋艺高手。他尚未登基时，与陈遂是很好朋友，经常一起博弈。但陈遂棋艺不敌宣帝，赌运也不行，为此经常输，还欠下不少债务。汉宣帝即皇后后不忘老友，将其提拔为太原太守。并告之这个职位“官尊禄厚”是个肥缺，陈遂是个忠实厚道之人，不想凭皇帝恩赐而获利，便婉拒了这个差事。直到了汉元帝时，因其品性忠厚被征为京兆尹，最后官至太尉。根据史书记载，围棋在汉宣帝看来是虽非道艺，但是朝政之余的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当朝中多人非议他与王褒等经常游猎还让人歌颂其行为时，他借用孔子语“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5]来为自己辩解，并且很快将陪他下棋的王褒提拔为“谏大夫”。汉代官员选拔主要是察举、征辟两种主要途径，在上述两例中，围棋竟然成为提升官职媒介，说明围棋活动已深入到朝廷选拔官员这样的高级政治层面了。《西京杂记》卷二中还记载了一位围棋“天下第一人”的“杜夫子”，有人讥讽他光知道下棋而耽误时光，他振振有词的反驳道：“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夫子如何从棋中悟出生活的哲理？我们无从所知。但其人称为“天下第一人”，这

本身就说明围棋有着极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是当时人普遍都能玩甚至很可能有大众围棋比赛活动举行，不然“天下第一”则无从谈起。

两汉时期围棋发展趋势总来说是良好的，一项重要原因是由于有统治阶级上层特别是皇帝的参与。另外一个重要的标识就是文人积极参与其中，使围棋文化得到长足进步，出现了一些涉及围棋理论的著述，比如现存最早关于围棋理论文章班固的《弈旨》，以及桓谭的《新论》、黄宪的《机论》等。须指出的是，班固在《弈旨》中，主要讲的是围棋之道，是一篇将如何布局、行棋的纯理论性的文章，这和后来指导性的围棋理论著述是一致的。至于桓谭的《新论》、黄宪的《机论》则将围棋棋理与治理国家、军事兵法结合在一起，可见人们对于围棋这一活动的本质认识从一开始就不同，这直接导致后代下棋者人文情怀的高下和差异。

二、三国时期的围棋

围棋发展到汉末三国时期，有两个显著特点值得注意，其一，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喜爱的雅乐活动。《汉乐府》中有佚名《古歌》中描绘当时人们宴乐情景：“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今存汉代画像砖、石上留下来大量这样的画图内容。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体育文物中有汉代围棋子实物，共25颗。质地为陶，分灰、白两色。双面鼓起，直径约0.8公分。《文物》杂志1978年第八期发表安徽省亳州博物馆“亳州曹操宗族墓葬”报告中提到出土文物中有“松绿石刻方子，一百二十二枚。见方1厘米，厚0.3厘米。分翠绿和墨绿两色。疑是棋子。”作者曾亲赴亳州见到报告中的“疑是棋子”实物，全是手工刻意为之的方子，大小和手感与当今围棋子一样。该馆参与发掘的同行告之，从数量、形制和两种颜色分析这就是围棋子。只是该墓早年被盗，棋子数量也残缺不全，加之未见棋盘，缺乏当时同类围棋子的参照物，故而报告时谨慎的将其认定为“疑是棋子”。当笔者撰

写此文再与亳州市博物馆原馆长任晓民核实时，他明确告知，今天已经可以确定是汉代围棋了。据史书记载，曹操是围棋爱好者且棋艺高超。《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张华《博物志》记述曹操本人爱好广泛，其中提到“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另有骑都尉孔桂也因“晓博弈、踰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6]魏文帝曹丕不仅文学成就斐然，更是弹棋、围棋高手。作太子时，常与好友作西园会聚，或饮酒赋诗，或“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7]，逍遥而畅快。那时围棋已与六经、百家论著文化地位相当，成为当时文人雅集不可或缺娱乐活动。曹氏父子的爱好必然与家族爱好有关，亳州曹氏宗族墓出土围棋也就不足为怪。

由于曹操爱好，无疑推动曹魏集团中围棋活动的开展，建安七子中围棋高手和围棋理论研究者就有孔融、王粲、应瑒之流。《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王粲）“强记默识”的本事十分了得，看见路旁的石碑即刻能将碑文背诵下来，而且“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记性好、计算能力强，这对下围棋帮助极大。同书记载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巾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这就是后代的围棋复盘，如果没有对围棋的深刻理解和爱好，以及超群记忆是绝难做到的。正如他在《围棋赋序》中所说：“清宁体道，稽谟玄神，围棋是也”。^[8]这是他对于围棋的理解和评价，可谓达到非常人所能体会的程度。难怪在他去世后，曹植作《王仲宣诔》说他：“何道不洽，何艺不闲。棋局逞巧，博弈惟贤。”^[9]曹魏还有一位名邯郸淳者，史书记载他：“博学有才章”，还擅多种书体。不仅如此，此人还兼通各种游艺娱乐，所著《艺经》一书中，罗列诸如投壶、弹棋、击壤、围棋等当时流行的大众娱乐活动，都能上升至理论研究。其中特别提到围棋之“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这对于研究汉魏时期围棋发展史具有极高文献史料价值。

正如战争最终是要决胜负一样，围棋的起

源一开始就注定结果是要争输赢的。于此有人认定围棋的起源与兵法战争有关，譬如桓谭的《新论》、黄宪的《机论》就将围棋之棋理与军事兵法融合在一起的。是以人们在进行围棋活动时，难免在娱乐的掩映下更注重于兵法运用、谋略的运筹。尤其在三国这一诸侯争霸、群雄割据、军阀争城掠地的混乱时代，这种智慧的较量显得尤为突出。建安七子中的应玚因爱好围棋，作《弈势》篇，开篇说到：“盖棋弈之制，所由来尚矣。络绎雨集，鱼鳞鴈峙。奋维阐翼，固卫边鄙。寇动北垒，备在南尾。”^[10]视下围棋若军事行动中战略布局，其文多处用行棋之法与历代战例互喻，形成独具特色的围棋理论名篇。有时纹枰之上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可棋盘之外却是刀光剑影的显现。《后汉书》记载：孔融因经常借古讽今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而得罪曹操，曹操无法忍受派人罗列罪名将其“下狱弃市”，还罪及妻孥。当时，孔融的儿子和女儿正在下围棋，见到来杀他们的人一点不惊慌，弈棋如常。这些人问他们：“父执而不起，何也？”他们回答：“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于是面不改色，从容赴死。当时孔融的儿子九岁，女儿才七岁。

费祎是蜀汉朝廷的高级官员，诸葛亮去世后不久，代蒋琬为尚书令。史书记载他“常以朝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11]不仅是在平常时期，即便在军情紧急关头，费祎亦能从容面对。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曹魏军屯兵兴势准备进犯蜀地，朝廷指派他率领军队前往抵御。光禄大夫来敏前来送行，请求和他下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此时的费祎竟全然不顾战事在即，专心于和来敏对弈。来敏见他如此镇定自若的下棋，其临危不惧的将者风度让来敏十分感慨，说：“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果然，当费祎率军抵达前线，曹魏军不战而退，费祎因此进封为成乡侯。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东吴陆逊。嘉禾三年（公元234年）陆逊和诸葛瑾配合孙权攻魏而进攻襄阳，陆逊的侍从带着孙权的密件

在回来的路上被曹魏兵抓获，诸葛瑾得知非常恐惧，认为敌方从缴获文件中掌握了我方机密劝陆逊速退兵。反观陆逊一点都不慌张，还忙着催人一面种葑和豆子，一面“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12]。视围棋与兵法有关在三国时期表现尤为极端，借博弈而暗藏杀机的例子，莫过于魏文帝曹丕暗算其兄弟任城王曹彰。曹丕“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13]。其弟曹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14]兄弟二人性格迥异，一文一武原本相得益彰。但在谁能执掌权力的诱惑下，最终兄弟反目。曹丕立为太子后心里一直担心诸位兄弟觊觎太子位，故而对曹彰、曹植予以打压。而曹彰不像曹植那样能忍受反而自认深得曹操喜爱又口无遮拦，其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世说新语·尤悔》记载：“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株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饼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兄弟二人均爱好围棋，于是曹丕趁机下毒。可怜勇猛有余而不具防范心理的曹彰竟然死于亲哥哥之手。此事在《三国志·文帝纪》中记载为“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记载是“任城王暴薨。”《世说新语》虽主要记载魏晋士人逸闻轶事，但提供了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所以，结合曹氏兄弟争夺太子位的史实来分析，曹丕对兄弟下毒手的这件事应当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围棋无形中就成了这场兄弟相残的道具和见证物。

东吴有长江天险的地理优势，决定了文人境地较之曹魏、蜀汉优越，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各类文化艺术活动都能很好发展。东吴文学成就不能与“建安七子”相比，但围棋风气最盛在三国中可谓风骚独占。如严子卿“围棋莫与为辈”^[15]，他与马绥明的棋艺特别高超，晋人葛洪称赞道：“故善围棋之无比者，则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16]葛洪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

的信息：“莫与为辈”“棋圣”，说明其一：围棋是东吴地区王公贵族休闲时相当普及的娱乐活动，对弈多才会显示严子卿的无敌；其二，“棋圣”必须是有一定规模对弈之后出现的竞赛结果。正因为东吴下围棋人众多，不少人沉溺其中以至于妨碍正业。太子孙和曾贬斥下围棋是毫无进取的娱乐，说：“当世士人宜讲修术学，校习射御，以周世务，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业，非进取之谓。”^[17]后来他和侍从官员宴饮说到围棋时，还强调下围棋“妨事费日而无益于用，劳精损思而终无所成，非所以进德修业，积累功绪者也……夫人情犹不能无嬉娱，嬉娱之好，亦在于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博弈，然后为欢。”^[18]发表上述言论之后，他还让在场的八位侍臣各自也写一篇文章来矫正人们沉溺围棋的毛病。当时太子中庶子韦曜退席后写了一篇议论上奏，文中从下棋者的人品到下棋这项活动均被他逐一讥讽、批判，其中说道：“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翫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陈，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袞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19]围棋自出现以来，言其利弊的两种对立观点伴随始终，前举孔孟言论亦可知之。而韦曜这篇洋洋洒洒达两万多字的批驳奏论，可算是目前最过激、最严厉的。他批判的有些现象如下棋者涉嫌赌博，忘却廉耻；沉溺围棋而“废事弃业”如此等等，的确应当受到谴责。但围棋本身不是为获得财富、追求功名之类庸俗的活动，更不

应该将其拔高到与封国、指挥上万人马的将军相等那样建功立业的高度，这就是忽略了围棋娱乐的本质，将个别视为普遍，韦曜观点以偏概全、因噎废食难以苟同。但这恰恰从另一方面反馈出围棋在东吴的兴盛，这恐与东吴当权者个人兴趣不无关系。孙策就喜欢下棋，史载：“策从容独与范棋”。^[20]于是在宋人《忘忧清乐集》中留下“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此不仅让我们看到三国时期对弈的珍贵史料，也是迄今留存下来最早的棋局。另在成书于北周的《碁经》^[21]中有“汉图一十三局”“吾图廿四盘”；“乃集汉图一十三势，吴图廿四盘”之语。“吾图”即吴图，书中总共入选汉代围棋图谱仅十三局，而东吴图谱达二十四盘之多。下棋者众必有高手出现，如孙策、吕范、顾雍、陆逊、严子卿、马绥明等，围棋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载体，在东吴十分广泛广泛自然与之深厚的土壤密不可分。至于有人沉溺其中并作为赌博来牟利，则是偏离围棋发展方向而另当别论。

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围棋

三国以降，围棋延续了既有兵家谋略的较量，又充满娱乐竞争的上一时代的特点。但若仅此两点来概括显然是不够的。宗白华先生概括评价该时代这样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2]这一时期政治特点是朝廷更替频繁，在讲究门阀士族等特殊政治环境影响之下，围棋文化深刻的受到影响。一批士人为保全性命常聚会于竹林，或饮酒赋诗，或琴瑟悠扬来标榜清高。避祸山林，崇尚虚无，清谈玄言，纵情享乐的社会风气反而促进文化艺术繁荣发展，文风如鲁迅先生所言“清峻，通脱，华丽，壮大。”^[23]但文章容易惹事，嵇康就是例子。于是围棋这种具有益智性的文化活动，成为显现名士风流，谈玄尚虚，矫情镇物，雅量高致的首选。

《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性情“傲然独

得，任性不羈，”曾放言“礼岂为我设邪”。其特立独行，傲然于世。当听说有做儿子的杀死自己的母亲这样的事，他出语惊人评论道：“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引来众人指责，连司马昭都认为杀父是天下最恶的事，怎么能认可呢？阮籍解释说：杀父可理解为“禽兽之类”的行为，但害母亲，则“禽兽之不若。”可见母亲在他心里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但当“性至孝”的阮籍一天正与人下围棋时，传来自己母亲去世消息，连对弈者都要求立即停止下棋，然“（阮）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24]再如豫章太守顾邵死，其父顾雍正召集僚属下围棋。得知外地的有信函传来却单单没有儿子顾邵的书信，其时顾雍“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濡”^[25]。以上两例是断然不会发生在以孝治国的两汉时期，“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们为求自保，多将真情藏匿于心中示人以不在意。阮籍有丧母之哀，顾雍有失子之痛，都属人间最悲伤之事，仍围棋不已。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二人并非因酷爱围棋置亲人去世于不顾，而是强压住内心的痛苦，不让外人因自己痛苦受到影响而怜悯自己。

散骑侍郎裴遐，此人善于谈玄说理，语词清楚而流畅。《晋书》记载：他“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未即饮，司马醉怒，因曳遐堕地。遐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其性虚和如此。”围棋原本就是名士所推崇的高雅活动，对弈者非风度翩翩，举止温文尔雅所不能。下棋行酒当然属于围棋文化范畴，但裴遐未及时饮酒而被拖拽坠地，周馥行为大失风度。然裴遐不仅没有因此而发怒，还能颜色不变下棋如故。阮籍、顾邵、裴遐等，所呈现给世人的不是度量而是雅量，时人谓之“矫情镇物”是也。

如果说丧子、丧母、受辱这类事尚能“棋如故”以示人物雅量高致的话，那么谢安面临的国家安危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则称得上大将风范了。淝水之战前，前秦八十万大军压境，东晋仅八万

人迎战。刚被提拔为征讨大都督的谢安部署完毕之后，竟与侄儿谢玄“围棋赌别墅”。前线驿书传来，谢安看完“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26]。说明并不是他对战事漠不关心，相反他十分在意战争的胜负。下完棋后，他返回屋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以至于跨门槛磕坏了屐齿，史书将其举动表述为“其矫情镇物如此”^[27]。所谓“矫情镇物”，即克制情绪并以此影响他人。这是魏晋时期所特有的一种行为表现，也是因社会环境压抑而造成的一种刻意的行为。前面的费祗、陆逊的故事与之相似，只不过阮籍、顾邵、裴遐、谢安的状态表现得最为充分和淋漓精致罢了。围棋不需要像六博、弹棋那样做出大的动作，对弈二人举手投子之间都必须表现儒雅和潇洒。当此之时，唯雅量高致者显现不同气度，名士表现高雅风范，围棋似乎就成为它物难以替代的文化符号而引人注目。其实，魏晋士人所谓“矫情镇物”，所谓“雅量”，不过是围棋文化的良好品格和时代精神结合的优雅体现而已。

魏晋之际，时局动荡严重影响士人精神世界，饮酒、服药、清谈、尚虚，成为远离政治的最佳生活方式。士人率直任诞，不滞于物，潇洒倜傥，不拘礼节。在这表象的背后，不过是“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28]的无奈。于是，在纵情山水，自信风流的极致状态下，围棋有了两个优雅称谓：“坐隐”和“手谈”。《南史·武陵昭王曄传》载：齐高帝第五子萧曄“与竟陵王子良围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献王谓曄曰：‘汝与司徒手谈，故当小相推让。’”《世说新语·巧艺》记载：“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裴启语林》载：“王中郎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另《水经注·渠水》引《语林》则记曰：“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或亦谓之手谈，又谓之棋圣。”上引虽文字略有不同，但传达出的意思是一致的。魏晋多故，士人“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29]。可以说这两个词汇的应运而生极其符合下围棋时状态和氛围。所谓“坐隐”“手谈”，展现的是对弈者凭隐几于

榻上,无论棋盘如何风云变幻,下棋者依然神情自若,棋子缓缓落下,恍若神仙般的状态,恰如其分的传达出魏晋围棋文化内涵与当时名士风范。

如果说围棋起源之初具有教化益智功能,那么两汉三国时期则逐步成为时人“志之空闲,玩弄游竞”^[30]的重要娱乐方式。受三国特殊时代影响,围棋中云谲波诡的斗智往往也是现实的浓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延续前代的这种文化特质,纹枰论道已为常态。与前朝时代特点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虽然在政权更替上更加频繁,南北分裂,非大一统天下。可地不分南北,政权无论汉族还是外族,他们对于围棋的爱好并无二致。史料表明,晋武帝司马炎、宋文帝刘义隆、宋明帝刘彧、齐高帝萧道成、南齐武帝萧赜、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宣帝萧誉等,都是围棋爱好者。君王好之,下必甚焉,围棋活动开展之广泛超越以往。

结语

综上所述,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围棋发展,为今天的围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文化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围棋成熟期和文化兴盛期。南宋高似孙在《纬略》中总结说:“棋之赋五,棋之论三。有能造悟其一,当所向无敌,况尽得其理乎。”他所说的五赋全都产生于这段历史,即:汉马融《围棋赋》、晋曹摅《围棋赋》、晋蔡洪《围棋赋》、梁武帝《围棋赋》、梁宣帝《围棋赋》;三论:汉班固《弈旨》、魏应珣《弈势》、梁沈约《棋品序》。这些论、赋的作者不仅是对围棋造诣颇深的“高品”之人,也是当时名士,所谓“汉魏名贤,高品间”。^[31]因此,他们对于围棋的理解就不光是停留在围棋本身,而是借围棋论人生、论哲学。“五赋三论”是那时期论述围棋理论文章,对后世影响深远,就因为它

所论、所赋不仅仅限于围棋,而在思想和文化。

该时期还在棋盘和围棋文化发展中有变异和提升,棋盘从流行的十七道线渐变成十九道。前引《碁经》中有“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棋有三百一十六道(应为三百六十一道之误),故周天之度数”的记载,说明十九道围棋盘在此时期已然定型。这种变化看似棋盘上只不经意的多刻了两道线,表面上是数字化的变异,其实这是文化内涵极大的提升。古代棋盘曾有十三、十五道线,汉代流行十七道线,棋道变数好像是围棋发展过程中的探索。而当棋盘变成十九道线,那么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仅仅比古代“周天之度数”多一位,却是文化内涵的一次深刻的增加。“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32]“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33]人们在棋盘四角定有“星位”,最中间的点称为“天元”,棋子由方变圆,棋子颜色分为黑白,神秘的阴阳哲学观念融入到娱乐文化中,所谓法天则地是也。

围棋从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上流行,除了行棋者较量棋艺一决高下之外,更多的能激发起人们思考、谋略、计算等益智的功能,因而引起人们所关注和喜爱。围棋作为体育项目之一活跃至今,除去所具有的上述功能外,也与自身蕴含的文化内涵密不可分。虽然中国古代尚未有西方近代体育这个观念,但它的娱乐、休闲、锻炼人的意志、公平竞争的特性,是与体育功能相通的。先秦以来,中国的竞技、益智之类娱乐活动可谓多矣,比如:擲菹、射覆、六博、双陆、藏钩、投壶、戏射等都曾兴盛一时,但没有一种像围棋如此深入大众而普及延续至今。如果一定要究其缘由,我认为除却其本身的魅力之外,围棋文化之深刻的内涵是其主要因素,这种文化从承继、流行、发展、定型,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是文化赋予了它顽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房玄龄等撰. 晋书·张华传 [M]. 中华书局, 1974. 1068.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本 [M]. 中华书局, 1980. 183.
- 〔3〕 范一直. 孔孟围棋观 [J]. 读书, 1987, (08).
- 〔4〕 班固. 汉书·五行志下·颜师古注 [M]. 中华书局, 1987. 1476.
- 〔5〕 班固. 汉书·王褒传·颜师古注 [M]. 中华书局, 1987. 2829.
- 〔6〕 陈寿. 三国志·明帝纪. 裴注引. 魏略 [M]. 中华书局, 1975. 100.
- 〔7〕 陈寿. 三国志·吴质传. 裴注引. 魏略 [M]. 中华书局, 1975. 608.
- 〔8〕 郭永勤. 魏晋棋文化探寻 [J]. 寻根, 2014, (06).
- 〔9〕 赵幼文. 曹植集校注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64.
- 〔10〕 吴云. 建安七子集校注 [M].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234.
- 〔11〕 陈寿. 三国志·费祎传. 裴注引. 祎别传 [M]. 中华书局, 1975. 1061.
- 〔12〕 陈寿. 三国志·陆逊传 [M]. 中华书局, 1975. 1351.
- 〔13〕 陈寿. 三国志·文帝纪. 裴注引. 魏书 [M]. 中华书局, 1975. 57.
- 〔14〕 陈寿. 三国志·任城威王彰传 [M]. 中华书局, 1975. 555.
- 〔15〕 陈寿. 三国志·赵达传. 裴注引. 吴录 [M]. 中华书局, 1975. 1425.
- 〔16〕 李昉等撰. 太平御览 (卷七五三) [M]. 中华书局, 1983. 3342.
- 〔17〕〔18〕 陈寿. 三国志·孙和传 [M]. 中华书局, 1975. 1368, 1369.
- 〔19〕 陈寿. 三国志·韦曜传 [M]. 中华书局, 1975. 1460-1461.
- 〔20〕 陈寿. 三国志·吕范传. 裴注引. 江表传 [M]. 中华书局, 1975. 1309.
- 〔21〕 佚名. 敦煌棋经 [A]. 盖国梁等编. 围棋古谱大全 [C].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6.
- 〔22〕 宗白华. 美学散步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177.
- 〔23〕 鲁迅.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M].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 1973. 80—98.
- 〔24〕 房玄龄等撰. 晋书·阮籍传 [M]. 中华书局, 1974. 1361.
- 〔25〕 余嘉锡撰. 世说新语笺疏·雅量 [M]. 中华书局, 1983. 343.
- 〔26〕〔27〕 房玄龄等撰. 晋书·谢安传 [M]. 中华书局, 1974. 2075.
- 〔28〕 祈欣. 阮籍诗文选译 [M]. 巴蜀书社, 1990. 100.
- 〔29〕 房玄龄等撰. 晋书·阮籍传 [M]. 中华书局, 1974. 1361.
- 〔30〕〔33〕 李尤. 围棋铭. 王韵殊等著译. 历代琴棋书画论选译 [M].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161.
- 〔31〕 沈约. 棋品·序. 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 (卷30) [M]. 中华书局, 1987. 3123.
- 〔32〕 班固. 弈旨. 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 (卷26) [M]. 中华书局. 615.

(责任编辑 杨丽华)

On Yang Xiong 's Writing Activities and Stylistic Practice

Dekao Xia

Abstract: Yang Xiong's writ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for book, one is for prose. Books include "Taixuan", "Fayan", "Fangyan", "Shuwangbenji", in addition to "Shuwangbenji", the rest of the books are kept relatively complete; prose articles are more complex: some are completely preserved, and some are residual articles, some are lists. On the other hand, Yang Xiong advocates the simulation in his activities, the behavior is related to its unique "narrative" concept. In the "narrative", on the issue of justice, it is equal to inheriting; But in the rhetoric, it is an innova-

tion. This is different from others, and showing a new cognitive attitude of Yang Xiong in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For Yang Xiong's emulation, we should realize the classic styles he follows, and the content is generally from his personal creation. In the stylistic aspects, Yang Xiong also has creations, which becomes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s.

Key words: Yang Xiong; narrative; simulation; writing behavior; stylistic practice

Personal profile: *Dekao Xia*, professor,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Zhejiang, 313000.

Cultural Theory of Weiqi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Zhengzheng Mei

Abstract: Weiqi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egan to pop, it ha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of the time background is very large,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Weiqi emphasis on the use of tactics, strategic operations.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t became a tool to show celebrity tastes. Weiqi as one of the sports can be active so far, is inseparable with its own cultural connotation. Although the ancient Chinese has not yet the

concept of modern sports, but its entertainment, leisure, practices of will pow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ir competition, are connected with the sports function.

Keywords: Weiqi, entertainment culture, time background

Personal profile: *Zhengzheng Mei*, Chengdu Wuhou Temple Museum,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uo Sacrifice Custom in the Traditional Rice Production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and Thai National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exchange

Changlong Lan

Abstract: "Tiaolingtou" of Guangxi and "Phi TaKhon" of loei province in Thailand are Nuo Sacrifice custom in the rice production of Han, Zhuang and Thai

nationality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ustoms of the two places, it helps to ramming foundation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The similarities of